

最新译本

# 李鸿章大传

双面人格，爱国者？卖国贼？似乎都是他  
全球视角，解读李鸿章的外交手腕 品评客观，论述李鸿章的处世之道

〔英〕布兰德◎著

陶艳丽◎译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http://www.hustp.com>

K827  
1849



# 李鸿章大传

〔英〕布兰德  
陶艳丽 译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http://www.hustp.com>

中国·武汉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李鸿章大传 / (英) 布兰德著; 陶艳丽译. —武汉: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2013.9

ISBN 978-7-5609-9215-0

I. ①李… II. ①布… ②陶… III. ①李鸿章(1823~1901)—传记 IV. ①K827=5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146221号

李鸿章大传

布兰德 著 陶艳丽 译

策划编辑: 刘晓燕

责任编辑: 刘晓燕

封面设计: 金 刚

责任校对: 孙 倩

责任监印: 张贵君

出版发行: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中国·武汉)

武昌喻家山 邮编: 430074 电话: (027) 81321915 (010) 84533149

印 刷: 湖北新华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60mm 1/16

印 张: 14

字 数: 172千字

版 次: 2013年9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定 价: 29.80元



本书若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出版社营销中心调换  
全国免费服务热线: 400-6679-118 竭诚为您服务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总编前言

英国下议院大厅里上演着许多生动的场景，斯皮克先生每天都在权杖的指引下，在其秘书和牧师的陪同下，从大厅走过来，而布拉克·罗德会进行周期性的巡视。他庄严地将议院的门打开，并在议员们被召到上议院前，敲三下门。但在我所见的情景中，最为令我印象深刻的场景发生在几十年前一个夏天的下午。在我走出下议院之时，李鸿章突然迎面走来，他急匆匆地走进去听一场辩论。在另一个世界的人看来，他个子很高，且面目慈善——身着一身蓝色的袍子，显得光彩夺目，他的步态、举止庄重，嘴角长挂着谦和的微笑，这表明他对其所见的一切都很欣赏。从这个外貌特征来看，与他同时代和下一代的人没有谁能与他亲近。这样说，并不是因为他给人以大权在握或是功勋卓著的印象，而是因为，他的态度传递了一种尊严，这种尊严就如同半人半神的自我满足和超然于世，但他又会为苦苦挣扎的人生而屈尊降贵。

关于这点，在他那依然很神秘的国家里，他似乎很具代表性。当我们还是身染靛蓝的野蛮人时，在某些方面，中国人就早已享有了甚至比如今我们更为优秀的文明；而且，随着政治的变迁，他们早已培育出了一种高标准的文化，对其他国家有着一种优越感和一种不为自身或其他国家的政治利益所扰乱的尊严。毋庸置疑，这些特点都源于他们的闭关锁国。约翰·贝尔先生曾于1715年受命于彼得大帝来过中国，如他所言：

从某种程度来说，中华帝国与世界隔绝了；其所处的地理位置，气候宜人且有益健康，东面和南面都有海洋环抱，北面和西面有连绵不

断的高崖和贫瘠的群山，那有名的城墙就蜿蜒在那些高崖群山上，形成了另一道防御工事。但，在我看来，其向西延伸了好几百英里的贫瘠的沙漠，在为帝国防御外敌入侵上，远甚于之前提到的任何工事……事实上，南面和东面的海洋是开放的，中国有可能在那边遭到袭击。但是我相信，没有一个王子会认为自己有理由去打扰如此强大的中国人民的宁静，他们更愿意与其所有的邻国和睦相处；而且，正如看上去的那样，他们似乎满足于自己的领土。

约翰·贝尔的话维持了一百多年，之后，正如他所说的那样，有人从南面和东面的开放海域袭击而来。李鸿章在19世纪历史上的意义在于：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名副其实的政治家。由于其出生、受教育及天性都遵从其民族传统，而且，对于陌生人，其蔑视之情自然流露，但他依然是中国承认“洋鬼子”不可小觑的第一人，承认他们已经到来，而且在将来会成为不可小觑的力量。然而，没有一人能更巧妙地带领其国人走进那个今后无法避免的国际舞台。而且，事实上，他有着各种各样的缺点，但他为中国和他自己在世界舞台上赢得的一席之地远比其本身的内涵更为重要。总之，李鸿章为中国迄今为止从未有过的外交政策奠定了基础。

贝西尔·威廉斯

1917年3月于切尔西

# 目 录

|                                  |     |
|----------------------------------|-----|
| 第一章 李鸿章初入官场与时局的回顾                | 1   |
| 第二章 早期生活与家庭背景                    | 23  |
| 第三章 中国官员李鸿章                      | 49  |
| 第四章 外交官李鸿章：与法、日的关系               | 77  |
| 第五章 外交官员李鸿章：与俄国的关系，海外游，1900年和平谈判 | 115 |
| 第六章 海陆大将李鸿章                      | 137 |
| 第七章 政客李鸿章                        | 161 |
| 第八章 李鸿章的人性方程式                    | 179 |
| 参考书目                             | 205 |
| 大事年表                             | 209 |
| 后记                               | 217 |

# 第一章

## 李鸿章初入官场 与时局的回顾

自1850年起，李鸿章在众多领域都进行了改革，这些改革都致力于改变中国人民的生活结构和行为方式。因此，毋庸置疑，他被认为是19世纪的开创者之一。但正如赫伯特·斯宾塞从史学理论出发，对何为“伟人”作的批判性分析所言：“伟人之所以为伟人，正如他与其先祖同为一脉，必与其所在时代的所有现象同生。在他成就时代的同时，时代也成就了他。”

出于该观点，为准确欣赏现代中国伟人的伟大之处，我们应研究其起源，并仔细考量其生存时代的政治背景。

在描述李鸿章毕生的事业及其对现代中国的影响之前，我们简单回顾其初入官场时中国的情况，并特别阐述欧洲物质文明对其产生的影响。在李鸿章作为抵御太平天国运动的领袖，从而为他非凡的职业生涯奠定基础的同时，西方军队和商人对与世隔绝的中国大举入侵，这注定会成为改变中国人民性情和习惯的决定性因素。突如其来的强大新势力，自然而然地会触动人们对所呈现出的变化的抵触情绪，而要适应这个过程是困难的、令人担忧的，因为这会威胁到国家政治体制。李鸿章作为一个优秀政治家的潜质也体现于此。他，几乎是当时唯一一人，立刻就认识到这些新势力的强大之处，以及面对它们的必要性的人。他学习日本的成功经验，对古老教育系统和政府职能进行彻底的改革。直到此时，中国所谓的治国之道，就是指长久以来的自给自足与群居生活；它们适用于在道德约束下的专制体系。终其职业生涯，李鸿章在其参加的各项活动中的伟大基调在于：他从一开始就知道，西方的蒸汽驱动与军事科学，必然会飞快将其祖国的许多古老的传统扔弃到容纳无用或过时之物的废品场。他引导跟随他的同胞们接受这一事实，并将改变他们生存环境的风险降到最低，这注定是要失败的。这不只是因为中国人民本身不能完成这一过渡，从某种程度来说，李鸿章本身也还保留着满清官吏的特征。不可否认的是大多数



他的工作都被污染了，因此，其效用也因个人的野心和爱财之心而受损。更有甚者，他最美好的愿望偶尔也会被儒家文化所影响。由于黑暗的尾随，他散发着更耀眼的光芒。他勇敢且热爱自己的祖国；他，无论是精神还是肉体都拥有超常的能量；他的资源无限；而且，他无论是在顺境还是逆境中都拥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品质。但当一切已成定局，从本质上他依旧保持着先祖灌输给他的思想，且背叛了造就他的社会形态。

让我们简短地回顾一下他初登政治舞台时的社会背景。他通过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得到了慈禧太后及其同僚的好评，这早在1851年就已成定局。是时，李鸿章年仅28岁，刚通过殿试，拿到翰林院通行证，成为了一名杰出的学院学者。太平天国运动是一场影响深远的运动，是一场对皇帝的复仇运动，它持续了超过13年，摧毁了9个省，并使中国减少了1亿多人口，是中国历史上有规律的社会动乱之一，是中国社会体系下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正如笔者曾指出的那样：“若我们回顾唐末开始的中国年历（或大约从英格兰诺曼底登陆开始），我们不难发现，在社会交替的过程中，总是会重复出现充满杀戮的农民起义。对于那些‘上天不再垂怜’的朝代，在朝代更替之际，一切都似乎遵循着某种节奏，有迹可循：在一个社会体系下反复灌输消极抵抗原则，与其所产生的后果一起，被认为是一种宗教责任。在经济压力缓解的空隙中产生的动乱，比欧洲经历过的任何一种动乱更为严重，此类动乱的后果就是大范围的人口萎缩。在幸存的人们的记忆中，他们所看到的是——在太平天国统治下的省份被放荒；且在西北反清运动的影响下，邻国过剩的人口成为这一地区被再殖民的一代，然后，紧接着，他们再次面临严峻的饥荒。”<sup>①</sup>

---

<sup>①</sup> 参见《皇太后治下的中国》（China under the Empress Dowager）第六章。

只要中国依然保持闭关锁国，和经济上的自给自足，无序和杀戮带来的灾难就会有规律地循环下去，加之以无节制的繁殖、对过剩人口的大规模迫害，毋庸置疑，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会将此视为人类不可逃避的命运。这个民族的恢复能力，因生活的残酷总会在这些灾难时期成功地被激发出来。尽管灾难重重，世界上最古老而可敬的文明已经建成，他因坚持以德治国而非武力治国得以源远流长。但太平天国运动与之前的起义不同，因为它并未遵循自然进程，去推翻一个连续三代皇帝都证明其已衰败，且不能实现以德治国的王朝。外国势力已投入武力以支撑衰败无能的满清政府。他们已成功地保住了该王朝的地位，然而，其权威已被动摇，且无望恢复。对于那些能读懂墙上告示的人而言，未来笼罩着黑暗，改革的危机迫在眉睫。李鸿章作为曾国藩的军事助理迅速得到认可。无论是从他在该领域的个人经历还是从他与戈登、华尔、白齐文及其他外国人的交往，他认为西方列强的军事实力已不是中国悠久的军事科学和治国之术所能抗衡的了。李鸿章以其清晰敏锐的洞察力预见到这种情景必然导致：中国无望重建旧秩序，若坚持旧秩序，甚至无法获得其主权和独立。至此，他的整个生命历程都记录着为让同胞们接受这一真理而作出的努力。他的努力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他的进步思想的影响力及其对当代政府的影响，这些被认为是19世纪的一大创举。而本书的目的就是阐明这些影响何在及如何实现。

李鸿章在1867年呈给皇帝的奏章中清楚地阐明：他抓住了西方影响这一契机及重建政府体系和国防以与之相适应的必要性。这一重要文件，为他之后的外交官和管理者生涯奠定了基础。所有这类资料会呈现在特定的课程中。有一点，在这里有充足的理由需要我们的特别关注：在当时，该奏章的作者是湖广总督，他敢在有着外国政治、军事控制的地方，提出改革，是何其胆大！要上呈这样一个奏章给皇帝

要有多大的勇气！这就让我们不得不反思当时中国的政治环境及其同僚，各省巡抚、中央权贵们的心理活动。由此可以断言，当时中国的行政机关、检查机关、高层官员、儒学家，依然保持两千年来中央王国的统治特色——与世隔绝。

对不熟悉中国政府体制的读者而言，通过对满族最后几位统治者的了解，来对其主要特征作一个简短的说明，或许有助于研究这位伟大总督的政治生涯。从理论上讲，从远古时期到20世纪初，中华帝国政府都是绝对的独裁政府，是一种原始的帝国主义，是基于父权和对先祖的崇拜，是作为儒家体系不可打破的附属品，成为人们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事实上，除乾隆那样具有很强权力意识的皇帝以外，皇帝的皇权就如同宫殿中仅供观赏的装饰物。出于某种目的，他的每个生活细节有法令、宫规规定限制，这使得天之骄子如同紫禁城的囚徒一般。作为天赐的家族体系中心，他就如同大祭司一样掌管着庄严的典礼。事实上，他所享受的主动权还不及九品芝麻官。即使在皇室专款和国帑这么重要的事情上，中国的绝对皇权都要优先考虑官僚阶级的意愿和忠诚，最后才是人民。这就是说，中国这政府的专制权授予了官僚群体，但历史表明，即便如此，也总会被人们随时准备启用的叛乱权力所限制；且影响中国政府体制的是道德而非体能或武力，这也是限制其专制的基本事实。因此，理论上官场上的专制通常会在实践中因群众民主意识的觉醒而被削弱。

已故的W.F.梅耶先生于1877年，在关于中国政府的著作上写道：

华人世界根基于普遍的官僚主义。在基督时代来临前几个世纪，官僚主义出自国家教育系统，由个人利益的驱动，违背了各种各样庄严、教条式的规则。

这一准确的描述，辅之以时代特征，给那些乐观理想主义者提出警告。因为即使在当时，这些人依然认为中国人民的民族特征和政治体系会有激进式的突变。

他写道：

对这些政事的关注，或许可以纠正那些过于乐观的观点。这些人过于乐观地认为：中国政府和人民已然接受踏上欧洲发展之路的快速入口。无论是从哪个角度来说，要踏上这条大道，必须废除最被珍视的民族信仰；废黜对文学偶像的崇拜；连曾被公认、被追逐的信条都将被蔑视和忽略。如果不是革命，在必要的强制下，这种改变或许也会实现。但这会造成一种错觉：这种变化是自由发展的结果。

太平天国运动带来的混乱和动荡，不仅动摇了满族的威望，使其永久不能恢复，而其残留势力——官僚群体的特权并未减弱，其自满也无丝毫的削弱。1860年后，仅出现了一个改进帝国政府的新特征——建立了一个处理外交事务的特殊部门。这一特征一直延续至今，那就是著名的理藩院，一个有名无实的机构。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地，它的人员以个人名义，向近乎石化的军机处靠拢，并信守后者顽固的保守主义思想，但也时而飘忽不定。在李鸿章任职总督的30年期间，理藩院只是作为中国政府和外国使者的缓冲剂而存在于北京，而非作为处理国家的外交事务而存在。直到1890年，其不存在于政府官方的国家部门名单当中，只是个多余的部门。接下来的章节，我们会看到，1870年至1895年25年中，外交事务几乎是由总督和北方贸易总管李鸿章兼任的。闽粤总督李鸿章于1896年抗日战争后调任理藩院。1901年，他早已目睹外务埠在旧势力优先的情况下成立，及道光皇帝支持新法治国的转变。若他目睹了满王朝的灭亡和1911年辛

亥革命，他将会看到中华传统打破混乱，并在政治经济动荡中重获其骄傲；他会看到官僚群体安然无恙的稳操胜券，超然于新中国与旧中国的对抗。

在李鸿章整个官场生涯中，皇权事实上是由高级官员、大都会及省级单位那些官员们，通过参与朝政来掌控的。自18世纪末乾隆皇帝之后，皇室宗族在身体、道德上的退化，使满族的威望日益瓦解及满族皇族衰败，且无力再统治中国。20世纪初，无论是人数还是实力，满族都被超越了。因此，从1860至1901年，朝堂官员们和总督们的职能渐渐由政治创新过渡到监管和规劝。自古以来，皇帝可用圣旨无理由地罢免任何官员，保证儒家传统不被亵渎；在这个动荡的时代，慈禧太后一生都只能凭借这个权力，把整个帝国撑起来。

除军机处——处理国家日常事务的主体顾问、大学士——满族统治下备受尊敬的群体之外，皇帝由北京的六大板块、九大部门，各省总督、知府，以及监察院辅佐。56名监察官的特殊职责就是告知皇帝对政府有影响的所有事件及人民的福利，并提出建议。两千多年来，他们的特权和职能，由一个朝代延续到另一个朝代，从未更改。甚至至今，在所谓的共和国的领导下，官僚体系下的很多机构及其职能都未曾改变，也不会改变。满族政权下的监察院已反映了公共服务道德的沦丧，“皇帝的耳目们”过于频繁地处置“叛贼”，而他们所有活动的目的，只是打击敌对的政治派系。黄金时代建立起来的监察院中不乏正直、勇敢、一直坚持法制的人，他们公开斥责腐败，是人民申冤的地方。这里有些人，仗着他们职权的不可侵犯性，大胆地批评朝廷胡作非为，甚至指向慈禧太后。但监察院还有一个职能，就是通过阴谋、腐败的间谍活动，或用阴谋直接针对某一高级官员，如李鸿章，希望能通过对抗来掠夺他们那已逾越体制的财富和声誉。

最后，在阳光和权威背后的政府，至嘉庆即位以来，一些宦官对政事的影响力逐渐增强，他们在“神圣的宫殿”中工作，与一切荣耀并肩而行。咸丰皇帝过着纸醉金迷的生活，他的那些庸奴们为他粉饰太平，这些行为无异于明朝末期的皇帝们。他死后，明妃——慈禧太后摄政期间，在太监总管的荼毒之下，她的近侍拥有了至高的权力，其权力甚至超出了紫禁城，在王朝各级官员中被给予了优先权。李鸿章是一个谨小慎微的人，同时他忠于以慈禧为代表的君主，又是慈禧太后最喜欢的管家，因为他对不义之财从不迟疑，并与太监总管李莲英——慈禧最宠爱的侍从，交朋友。李莲英对朝政的影响始于1870年，终于1908年慈禧太后去世。根据满清王朝的族规，宦官不能执政，不能以任何理由离开京城。咸丰即位以前，这些规则都得以强制实施。但在慈禧太后摄政时期，一如明末朝政风气，将权力下放给宦官，贪污腐败之风盛行。她执政期间，滥用职权之风盛行。直到1898年戊戌变法后，她最喜欢的李莲英替她掌管她的小金库，慈禧经常公开地夸耀他，他能决定王朝的高官们的成败，但李莲英藐视皇帝的皇权。李鸿章的官场生涯在很多方面都被绑住了手脚，而他的政策，因李莲英和他的追随者们的阴谋，未能得以完成。<sup>①</sup>最明显的事件就是抗日战争中的海军军费问题，及之后与俄罗斯签署的秘密协议。即使是在1889年到1898年，光绪成年后，慈禧太后退居颐和园之际，李莲英那双无形的魔爪依然通过她，操控着上层官员的任命和调动，攫取洋务运动的果实。

这些宫中“谄媚小人”所施加的影响，就如京城各部及都察院那些顽固不化的官僚一样，从一开始就反对自由思想与改革措施的介入，而从李鸿章那宽广的视野来看，那正是拯救这个国家必不可少的

---

① 《这些来自中土》（These from the Land of Sinim），伦敦，1901。

东西。

1901年，义和团运动爆发了。在混乱中，在中国问题上的乐观主义者鹭宾·赫德先生将其归咎于中国统治者从未改变，也不会改变的傲慢态度。用他的话说：“这种自古以来的傲慢，源自于其自以为是和愚昧无知。”<sup>①</sup>从某种程度来说，这种冷漠傲慢的态度，是其对很多事情无动于衷的逻辑基础。但即使是李鸿章第一次试图通过公开演讲来改变这种状况时，在他的语言中依然透露着那种根深蒂固的“种族自豪感，智力优越感，以及对自己文明程度及祖国霸权的优越感”。我们或许对这种在面对显而易见的事实时，依然因其与生俱来的骄傲而顽固拒绝的态度感到惋惜；但在面对这种不屈不挠的民族精神时，我们又不得不对他表示敬佩。他们坚信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他们认为坚持闭关自守的政策是正确的，且依旧相信除中国以外的东西都是蛮夷。

李鸿章初入官场时的中国，无论是从道德还是从智力上来说，都还处于古中国时期——社会结构极具凝聚力，以农业人口为主，他们是生活在敬拜先祖中有神论者，他们相信善恶皆有报，对此起彼伏的动荡、反叛、侵略都无动于衷，只是很好地保存了先祖留下的先进文化。正如我们夸耀我们欧洲文明在科学艺术上、发明创造上的成就一样。出于本能的尊重，有时甚至是嫉妒也是存在的。不管是事实上，还是功利上，中国都传递着其在冥想哲学，及其宏伟历史遗迹上的优越感。在欧洲从原始社会过渡到希腊罗马文明以前很长一段时间，这种君主制下的伦理学，成功地将世界人口的三分之一烙上了深深的民族的烙印。一方面由于她的地理特征；另一方面，如历史所证，由于其自给自足经济特征，中国在其历史长河中从未认识到“无规则的次

---

<sup>①</sup> 《开放的中国》，查尔斯·古兹拉夫著，史密斯·埃尔德公司（Smith, Elder & Co.）出版，伦敦，1838。

要生殖”。她生活在自己的梦境中，更多地关注根本原因而非现时结果，甚至在之后西方蛮夷翻天覆地改革发展之际，她依然泰然自若。这梦境拥有着比新教义或科学发明还要强大的力量，那是她铭记于心的古老信条，是她的无比神圣的信仰。有时，在闭关锁国的漫长历史中，总会有令人不安的声音从西方国家传来。印度对其遥远边境的入侵，以及印度-塞西亚在征服中亚之时，发出“光荣属于希腊”的微弱回声，都已传入了中国，并传到了西方贸易沿线最为遥远的边境，记录到了瞭望塔与佛寺当中。整个中世纪的欧洲，波斯、阿拉伯和印度的商人们冒险将其南部的香料、乳香、象牙和宝石带到欧洲。除此之外，他们还给这些货物赋予了很多奇闻，讲述了中央王朝未知蛮夷世界，及那地图上未知的遥远水域的礼仪和风俗习惯。13世纪、14世纪时期，圣方济会牧师，以及来自地中海东部与爱琴海沿岸国家、岛屿的商人们，途径印度洋，不辞艰险来到华南。从此时开始，她的统治者就对此时天主教下的欧洲有所耳闻。但儒家学者们依然对其漠不关心，他们的骄傲自大使其对外界的事务缺乏好奇心。马可·波罗及其亲人们在忽必烈时期造就的声誉及影响，在元代历史记录中几乎是无迹可寻的，甚至很快就从中国历史记录中销声匿迹了。与此相同，他对13世纪 Far Cathay的描述，直至200年后被葡萄牙航海家唤醒以前，在西方世界的记忆中已经完全形成。然而，他们却被北京人认为是来自蛮荒之地的可怜人并受到歧视，他们在最受辱的情况下被允许在广东进行贸易。

当第一批英国自由贸易商人进入中国，打破了自1834年以来东印度公司的垄断，部分聪明的官僚就预见到了这些人背后海外势力的威胁。在300多年前，律劳卑代表国王而非公司在广东进行贸易。在中国与欧洲的往来中，其统治者并未对她为宇宙中心的传统观念有所动摇，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英国发动对其的战争，中国政府及其国民依



然坚信——“统治他们的唯一正确方法就是专制暴政”——明智的天子政权定会战胜那些入侵的蛮夷。正如1838年，牧师查尔斯准确地描述天朝上国是“完全脱离了整个世界，并极其藐视其他任何国家”（“China Opened,” by the Rev. Charles Gutzlaff (Smith, Elder & Co.), London, 1838）。其他任何国家都被认为是蛮夷，“他们注定要生活在天圆地方的地球末端，或四海中以其为中心王国的小岛屿中”。查尔斯还这样写道：“他们的权威认为世界是一个统一的帝国，环绕四海，赋其子民以怜悯之心。同样，她环抱其他国家，以同样的怜悯待之。但同时，若其蠢笨到不承认世界上唯一至高无上的文明国度，他们将会被发配到遥远的蛮荒之地。”第一批英国访华使者马戛尔尼伯爵和阿默斯特勋爵，他们穿过西藏、尼泊尔来到大陆，给当时的统治者带来了莫卧尔帝国瓦解及白人军队在印度占据绝对优势的信息。但当听到这些消息时，其统治者依然不为所动，继续以其天朝上国的态度来对待这些使者。无论是乾隆皇帝颁发了诰命给马戛尔尼伯爵伟大的乔治三世陛下，并于几天后在热河接待了他，还是嘉庆皇帝于1816年颁发给乔治四世的诰命里，其愚昧无知都尽显了这种思想。<sup>①</sup>

在第一次与英国的战争中战败后，中国政府于1842年签订了南京条约，直至李鸿章在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成为欧洲雇佣兵的组织者开始，西方的影响才慢慢打开了一小部分人的视野，他们开始怀疑当时的霸权。但这并未影响到北京政府及其代表在省会城市的傲慢态度。甚至连1860年，英法联军占领北京、焚烧圆明园也未动摇其态度。因为这个民族的傲慢早已根深蒂固，在人们的道德观念中种下的种子，是任何显而易见的事实和政治信念所不能动摇的。这种观念

---

<sup>①</sup> 参见《北京宫廷年鉴及回忆录》（Annals and Memories of the Court of Peking），海勒曼公司（Heinemann）出版，1913。